



# 21 世纪中国国际战略“路线图”

21 世纪的人类正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能源消费的迅速上升使世界气候大变,地区冲突、核扩散、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威胁世界和平,意识形态歧视、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及国际规则制订和执行中的双重标准常常在国际关系中掀起摩擦和冲突,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灾难,南北差距的扩大正在造成国际关系中众多不稳定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和反思一下“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展望未来的中国与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文 / 沈骥如

## 中国在 21 世纪的追求

我在《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一书中讨论了“中国在 21 世纪的追求”,说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人说苏联的解体是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

第二件事是由于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1996 年台湾海峡出现了紧张局势,中美关系转凉,而 1997 年江泽民访美时,两国又决定“努力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又转暖。

第三件事是 1996 年中国出了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该书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说出了一连串的“不”,如“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不要忌言‘准备打仗’”、“遏制、反遏制、反过来遏制”、“焚烧好莱坞”、“我们不要最惠国待遇,将来也不会给你这个待遇”、“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等,仿佛中美就要断交、明天就要打仗,一副中国要充当世界的救世主,取美国而代之的架势。

这三个问题使我不得不思考:苏联解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中国作为仅存的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维护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能不能用一个“不”字就能概括?中国在 21 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应该追求什么?

第一,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来自苏联内部:苏联与美国的争霸战略使苏联树立了敌人,失去了朋友,耗尽了国力;失败的经济改革加重了苏联的社会危机;对不同意见的高压政策使苏共失道寡助。

第二,如何确保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欠发达国家取得最终的胜利,取决于我们能否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否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列宁说过:“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他还说过:“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他还列出了一个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合=社会主义。”苏联没有这样做,而是热衷于军备竞赛,不惜代价地与美国争霸世界,拼尽了国力。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制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等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因此不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第三,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历史经验的积累,有四种制

约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走向对抗的因素在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抗是可以避免的。“我国的外交,应该摒弃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性循环模式,即: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对峙争霸——冷战。建立一种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良性循环模式,即:和平共处——平等的合作与竞争——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搞对抗、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繁荣。”我们要促使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从被迫与中国共处、合作,逐渐变为习惯与中国共处、合作,进而,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其他的共同利益,将促使他们最终积极地与中国开展全面的合作。”21世纪对中国和对世界来说,都将是一个全面进步的世纪。

第四,苏联与美国全面对抗,在联合国频频使用否决权,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因此得了个“不先生”的绰号。中国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丰富的、合情合理的和平外交政策,决不是用一个“不”字概括得了的,也不是用一个“不”字执行得了的。当中国的独立、主权受到侵犯的时候,中国人民从来都是敢于用语言和行动起来“不”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但是,中国在21世纪决不会充当第二个“不先生”,我们想说的更多的词语是:“对话”、“理解”、“信任”、“历史性的和解”、“共同的利益”和“持久的合作”。

### 通往世界经济“一极”之路

为什么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极”?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极”?12年前,我曾经指出,中国需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做3件大事和10项努力。要做的3件大事是: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进程、积极参加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要做的10项努力是:1、拒绝经济霸权,承认经济主导权,分担经济主导权;2、积极开展大国经济合作;3、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4、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保护民族工业的关键;5、通过资本输出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6、确定外贸规模的安全警戒线;7、构建中国对外开放的依托体系;8、开展国际金融合作;9、广筹资金;10、取得人才争夺战的胜利是科技兴国的保证。

### 完整的国际战略“路线图”

分析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趋势,对中国推动多极世界形成的战略至关重要。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促进世界的多极化,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存在的基础,也就是说,促进世界的多极化,是与反对霸权主义相联系的。不言而喻,今天的霸权国家是美国。那么反对霸权主义是不是要和美国对抗呢?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中国庄严承诺永不称霸,因此中国与苏联不同,不会挑战美国,与美国对抗。多极世界应该有美国的位置,中国应通过与美国的真诚合作帮助美国在21世纪告别自己的霸权主义,这既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利益。我认为,21世纪所需要的国际新秩序,不是要寻找一个替换美国的新超级大国,不是要形成一个新霸权国家,而是要把美国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请”下来,建立一个没有霸主的、平等协商的、民主和谐的、新的国际秩序,使周而复始的一个个大国称霸的时代成为历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关系不是谁消灭谁,而是通过建立一种积极而健康的共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来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和谐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应该使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有均等发展的机会。中国所要争取的,只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环境和权利。

第二,有武装才能享受和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武装力量要完成保卫国家和履行维护多极世界和平的联合国国际义务,中国的军备,必须拥有一条比较完整的现代高科技武器链。也就是说,高技术武器,不必样样拥有,但主要的环节,必须拥有。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这尤其重要。否则中国的威慑力量就是不完整的,没有选择性的。中国的军备水平,至少应与法国相当,至多达到世界第三位,即位居美国 and 俄罗斯之后……我反对认为航母是进攻性武器,中国不威胁别国,所以中国不需要航母的说法,主张中国应该拥有向海外投掷部队的能力,发展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洋作战能力。还应发展我国的C4I指挥系统(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系统),加强信息的收集、处理、传输和作战的指挥协调能力。

第三,把国内的社会和谐与国际战略相联系,我

曾专门论述了“社会和谐·国际战略的后盾”问题。社会的和谐,产生于利益的一致和协调,而社会的不和谐,产生于利益的不一致和不协调。没有社会和谐,就不会有安定团结。一个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凝聚力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经济、国防、外交,等等,即使有了,也不能有效地运用这些力量,而且,随时会由于国内的动乱而垮下来,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情况,就要发生。这是苏联解体给我们留下的惨痛历史教训。所以,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是否能得以贯彻,与国内的社会是否和谐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的经济改革,必然涉及人们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必然造成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利益差别出现,必然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心理状态发生深刻的影响,也会对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发生深刻影响。如果对这些利益分配的变化不加以协调,社会就会出现不和谐因素,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国家的存亡。因此,社会和谐是国运所系。腐败对社会和谐形成致命破坏力,尽管资本主义的影响是腐败产生的原因之一,但大量事实表明,在我国,腐败的深层根源是封建主义,光宗耀祖、裙带关系、家长作风、“包二奶”,都是封建社会的发明。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清除腐败、实现和谐社会的有力手段,还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廉洁政府”,各级干部都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作到“言必信,行必果”。

### 辨别两种职能,增强外交韧性

1988年,我在博士论文《欧洲共同体与世界》(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梳理了马克思的国家职能学说。马克思的国家职能学说,对于我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一书中,我也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认为,任何国家,都有两种国家职能。其一是“国家的阶级职能”,主要是指国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阶级统治职能,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其二,国家还有一种职能:“国家的社会职能”,这种职能,表现在国家要缓和对立阶级的冲突、要防止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要对经济进行组织和管理。

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的社会职能”在不断扩大和强化。要善于区别国家的两种职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的阶



级职能”领域只能“存异”,而在“国家的社会职能”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而且要看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如美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国家的社会职能”会制约美国政府的“阶级职能”,中美的相互依赖关系越紧密,这种制约力量就越强大。而在中美关系转暖时,也要看到,“国家的阶级职能”会约束美国的决策层,包括总统,不能与中国靠得太近。掌握了马克思国家职能理论,我们就能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在关系不好时,不会对前景太悲观,或作出过度反应;在关系良好时,不会由于过于乐观而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失去警惕。

克林顿总统刚刚和中国决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一个月,就宣布要把中国和俄罗斯列入美国的核打击清单。这是国家的两种职能在克林顿总统身上的表现。

无独有偶,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1月访华时在与中国国家主席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明明表示:“美方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但奥巴马一回美国,就宣布要向台湾出售武器,与克林顿总统的“变脸”异曲同工,也是国家的两种职能在奥巴马总统身上的体现。今后不管谁当美国总统,类似的事情难免还要发生。所以,我们对中美(同样,中欧、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性要有充分的认识。

我们主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应该相互尊重,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对话,增进互信,通过平等互利的合作,实现共赢。而要实现共赢,就要学会妥协。所以,我曾具体分析和强调“妥协·国际关系中形成历史合力的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